

在我这样的外地人眼中，上海是中国城市历史中，最具沧桑美感的一册旧书，蕴藏着万千风云和无限心事。这里的每一处老弄堂，都是一句可以不停注释的名言，注脚层叠，于我来讲是陌生的。但有一处地方，在记忆中却仿佛是熟知的，就是四川北路。这条路留下了许多历史名人的足迹，而其中最难抹去的，当属鲁迅先生了。鲁迅曾在致萧军萧红的信中，提到这条路：“知道已经搬了房子，好好好，但搬来搬去，不出拉都路，正如我总在北四川路兜圈子一样”；而萧红1936年在日本写给萧军的一封信中，也提到它——“在电影上我看到了北四川路”，她也因之想到了鲁迅先生。

2017年岁尾，在《收获》杂志六十周年庆典上，在太热闹的时刻，很想独自出去走走，有天上午得空，我吃过早饭，叫了一辆的士，奔向四川北路。我去拜访谒原虹口公园的鲁迅先生墓，这座墓从当年的万国公墓迁葬于此，已经一个甲子了。天气晴好，又逢周末，园里晨练的人极多。入园处有个水果摊，苹果橘子草莓等钩织的芳香流苏，连缀着世界文豪广场。红男绿女穿梭其间，不为膜拜文豪，而是踏着热烈的节拍，跳整齐划一的舞。他们运动许久了吧，身上热了，大多将外套脱掉，只穿绒衣。广场边一棵粗大的悬铃木，此刻成了衣架，被拦腰系了一圈白带子，穿着吊钩，紫白红黄的外套挂在其上。我努力避让舞者，走进广场。文豪们的铜雕均是全身像，或坐或站。可怜的托尔斯泰，他右手所持的手杖，挂着一个健身者的挎包，一副苍凉出走的模样，可惜我不吸烟，不然会在他左手托着的烟斗上，献一缕烟丝，安抚一下他。与他一样不幸的，是手握鹅毛笔的莎士比亚和狄更斯，鹅毛笔成了天然挂钩，挂着色彩艳丽的超轻羽绒服。最幸运当属巴扎克，他袖着手，深藏不露，难以附着，这尊雕像也就成了一首流畅的诗作。

出了世界文豪广场，再向前是个卖早点的食肆，等候的人，从屋里一直排到门外。想着多年前萧红在这一带，有天买早点，发现包油条的纸，居然是鲁迅先生一篇译作的原稿。萧红愕然告知鲁迅，先生却淡然，复信调侃道：“我是满足的，居然还可以包油条，可见还有一些用处”，也不知这里的早点铺，如今用什么包油条？还能包裹出这拨云见日般的绮丽文事么？

绕过食肆向前，更是人潮汹涌。我望见了推着童车散步的中年妇女，玩滑板的疾驰而过的少年，聚集在电动车上打牌的老人，立于树间吊嗓子的小生，以及在路中央手持毛刷、蘸着水写下“江山如此多娇”的歪戴帽子的男人。当然更多的是占据着每一处空地，跳广场舞的人。尽管立在路旁的音频显示器，提示分贝不超，但各路音乐汇聚起来，还是无比喧嚣，将自然的鸟语湮灭了。只见鸟儿一波一波飞过，却听不到它们的叫声。

这幅世俗生活的长轴画卷，在渐次打开的时候，我也领略了背景上的植物风光。槭树正在最美时节，吊着一树树红黄黄的彩叶，被阳光照得晶莹剔透，看上去激情饱满，像要与旧时代决裂的起义者。除了槭树呈现壮丽之色，也有耐寒的杜鹃绽放，那红的粉的花朵，在我这个刚经历了哈尔滨十二月飞雪的北方人眼里，无疑是日历牌上被漏撕的春日，零零散散，却透着春的消息。

鲁迅墓很好寻，无论哪条甬道，都有通往那里的指示牌。赏过如火的槭树，直行约三百米左转，绕过一群喧哗

唱戏的人，再右转北上，在公园的西北角，就是鲁迅先生的墓地了。墓前广场比较开阔，最先看到的是长方形草坪上矗立着的鲁迅塑像（这块草坪不是一册《野草》呢），他坐在藤椅上，左手握书，右手搭着扶手，默然望着往来的人。由于塑像有高大的基座，再加上草地四围，有密实的冬青做了天然藩篱，肃穆庄严。不过基座过高了，感觉鲁迅是坐在一个逼仄的楼台看戏，让人担忧他的安危。

墓地两侧的石板路旁，种植着樟树、广玉兰和松柏，树高枝稠，长青的叶片在阳光下如翻飞的翠鸟，绿意荡漾。我随手摘下一片广玉兰的叶子，拈着它走向鲁迅先生长眠之所，将它轻轻摆在墓栏上，想着烘托了一季热闹花草的叶片，是从花海中荡出的一叶扁舟，心房还存有花朵的芳香吧，权当鲜花。何况在我的阅读印象中，鲁迅是不怎么写花卉的，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和《秋夜》中，提到蜡梅一类的花儿，要么一笔带过，要么对所描述的花儿，连名字也叫不出来。他最浓墨重彩的写花，是在《药》中，结尾处瑜儿坟头的那圈红白的花儿（也是无名之花）。可见他笔下的花儿，是死之精魂。

鲁迅墓由上好的花岗岩对接镶嵌，其形态很像一册灰白的旧书，半是掩埋半是出土的样子。因为是园中独墓，看上去难显赫，却也孤独。其实无论是鲁迅的原配夫人、为他寂寞空守了四十年的朱安，还是无比崇敬鲁迅的萧红，都曾在遗言中表达了想葬在鲁迅身旁的想法，可惜都未如愿——怎么可能如愿。鲁迅曾在文章中交待过后事：“赶快收殓，埋掉，拉倒”，也曾《病后杂谈》中表达过，他不喜欢被追捧，不喜欢挽联，倘有购买纸墨白布的闲钱，不如选几部明清野史来印印，这些表述绝非是故作超拔，这像他的脾气，这像一个目光如炬的人穿行于无边的黑暗时，留给自己的大解脱——最后的光明。可鲁迅的一生，是雷电的一生，身后必将带来风雨，不会是寂寞。

鲁迅墓前并不安静，左右两侧的石杆花廊下，一侧是两个男人在练习格斗，互为拳脚；另一侧是三位大妈，在热聊什么。多了门铃，我脱帽向着这座冷清的墓，深深三鞠躬，静默良久，之后转身，眺望鲁迅长眠之所面对的风景，有树，有花，有草，有路，也算旖旎，也算开阔，只是那尊端坐于藤椅上的雕像，阻碍着视线。也就是说，不管鲁迅是否愿意，他



笔会

每天要面对自己高高在上的背影。墓前甬道尽头相连的路，人流不息，向右望去，可见虹口足球场的一角穹顶，像一团铅灰的云压在那里。健身和娱乐的各路音乐，此起彼伏，让我有置身农贸市场的感觉。我想鲁迅被葬在这闹市的园子中，纵有绿树青草点缀，春花秋月相映，风雨雷电做永恒的日历，但终归少了一个人去后，最该拥有的宁静清寂，所以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安息了。

当我怅然离开墓地的时候，忽然间狂风大作，搅起地面的落叶和尘土，在半空飞舞。公园所有的树，这时都成了鼓手，和着风声，发出海潮般的轰鸣。我回身一望，我献给鲁迅先生的那片玉兰叶，已不见踪影，我似乎听到了他略带嘲讽的笑声：敬仰和怀念，不过是一场风，让它去吧！

离开鲁迅墓地，迎着风中被撕扯下来的艳丽的槭树叶，我去参观鲁迅纪念馆。馆藏丰富，我留意的是那些曾与鲁迅相依相伴的实物，他戴过的硬硬的礼帽，这礼帽是再也不能为他挡风了；他穿过的棉袍以及蓝紫色的带花纹的毛背心，这样的衣物也再也不能为他避寒了；他用过的白瓷茶碗依然好看，但它再也不能为他送去茶香了；他用过的吸痰器，不能再为他排解胸中郁积之物了（真正



文匯八十



知否，知否，应是绿肥红瘦（国画）马小娟

的郁积，靠它也是排解不了的吧），而那一支支笔，也再也不能随他在纸上叱咤风云了。展厅里还陈列着鲁迅逝世后，送殡者登记册，我俯身辨识那上面的名字时，有面对星空的感觉，因为那里登记着的，都是些灼灼闪光的名字。离开纪念馆，风小了一些，我出了公园，一路打听，步行去鲁迅在大陆新村的最后寓所——山阴路132弄9号。大陆新村是一带红砖的三层小楼，木格高窗，旧时住的多是日本侨民，鲁迅故居在9号最深处。一走进去，先看见一家紧闭的店门外，挂着一个牌子，上书“老板出去流浪了，月末回来”，而有烟火气的地方，窗前和檐下多摆着盆栽的花草。我走进鲁迅故居售票处时，已是正午，只有一个保安坐在里面，他告诉我参观要等到五十分钟后，因为故居开放是分时段。见我沮丧，他说你也不得吃午饭吗，出去吃点东西，回来后就到了。我接受了他的建议，走出9号院，去了对面的万寿斋。这家小吃店是上海的老字号吧，店面不大，食客甚众，无一闲位。我排队买了一屉蟹粉小笼，打包出来，又回到鲁迅故居售票处，问保安可否容我坐下，边吃边等开馆时间？保安同意了。一屉汁水浓厚的蟹粉小笼包落肚，卖票的回来了，她身后跟着四位要参观的游

客，一对母女，还有两个中年男人。我们买了票，由保安带领，出了售票处。一壁之隔的鲁迅故居门前，已有一个纤细的女孩迎候在那里，她是鲁迅故居的志愿者讲解员。保安像个大管家，掏出钥匙，打开黑漆的铸铁门，将我们带进去。由于屋内没有开灯，加之房间格局紧促，虽是坐北向南的房子，一进去还是给人阴冷的感觉。讲解员介绍着一楼会客室的陈设，餐台餐椅，墙上的画等等，而我的目光聚焦在了瞿秋白寄存此处的那张著名的书桌上了。只三二分钟吧，就被保安吆喝着去二楼。二楼是鲁迅的书房兼卧室，不很宽敞，南窗和西墙摆放着书桌、藤椅、镜台、茶几、台灯等旧物。最让人触目惊心的是近门处东墙边的那张黑色铁床，上面还摆放着棉被和枕头，鲁迅先生就是在这张床上，吐出最后一口气的。而那最后一口气是真的散了，还是附着在了室内的台灯上，做夜的眼？或是附着在了南窗的窗框上，做曙光的播撒器？

保安又催促着上了三楼，海婴的客房，以及客房都在此。看着小小的客房，想着瞿秋白曾在此避难，也曾在此奋笔疾书，无比伤怀。这时参观者中最年轻的初中生模样的女孩发现了问题，她问讲解员，二楼有鲁迅的床，三楼有海婴的，许广平睡在哪里呀？讲解员一时被问住了，女孩的母亲赶紧说，许广平要和鲁迅睡一张床，要么是海婴。我加了一句，海婴有保姆的。女孩依然很不满地嘟囔道：许广平为什么没有自己的床啊！

保安已下到一楼，他在下面大声呼唤讲解员，让她赶快带游人出来，说是时间到了，其实我们进来不过一刻钟。下楼时我走到最后，又在二楼鲁迅卧室门前驻足片刻。等我下去，保安在训斥讲解员，说她不该把游人留在最后，说这是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好像我走在最后，似有不轨意图。

我郁郁出了鲁迅故居。其实我很想看看灶房的陈设，萧红不是在这儿为鲁迅烙过东北特色的韭菜盒和油饼吗？

我回到山阴路上，风又起来了，这条路成了风匣，回荡着风声。我去寻访不远处的那扇破门，见黑漆大门紧闭，门上贴满了菱形贴纸印痕，分明昭示着“福”字曾居其上，想来这里还住着人家吧。而这扇门，却也是瞿秋白生命中难得的一扇破门，因为在此期间他与鲁迅交往频繁，纵有有时被捕的危险，但有倾心长谈的挚友，仍是人生的黄金时光吧。

鲁迅先生与很多青年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，萧军萧红，台静农，瞿秋白等等。读鲁迅书信时，发现他最喜欢与两个人谈病情（当然他们也深切关心着他的身体），一个是母亲，一个是小他二十几岁的台静农。谈病如同谈隐私，多半是对亲人才讲的话题。而同样比鲁迅年轻许多的瞿秋白，更是深得他欣赏，有鲁迅赠与瞿秋白的手书“人生得一知己足矣，斯世当以同怀视之”为证。瞿秋白就义后，鲁迅抱病为他编校《海上述林》。我读瞿秋白的《多余的话》时，感觉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流露的还是对做一个文人的万般不舍。

在瞿秋白故居吃了闭门羹，我赶紧折回，因为午后《收获》杂志有作品朗诵会，我怕迟到，所以赶紧打车，想回到酒店稍事休整。可是往来的出租车，基本都载客，显示空载的车辆，停下的一瞬，总问我是约车的人吗？我这才明白，因为我不用手机上网，不能随时网上预订出租车，空驶的出租车与我这个不与俱进的人来说，多半无关了。也就是说，我在漂泊的河流上，看见灯塔闪亮，那也不是引我上岸的。

这倒让我淡定起来，轻松起来，想着万一迟到，那是为着鲁迅先生而迟到，不无美好。我迎着风，在山阴路上徘徊。相比鲁迅的杂文，我更偏爱他的小说，尤其喜欢《故事新编》，尽管他在致捷克汉学家普实克的信中，说这本小说神话和传说做材料的书，并不是好作品

诗，署名泰戈尔，称摘自同年第5期《女子文学》，但该杂志一位编辑透露，是从网上弄来的，不可靠；二是香港女作家张小娴1997年完成的小说《荷包里的单人床》的封面上借书主人公苏盈之口说了这段话，在该书2000版的序中张小娴声明不是抄泰戈尔的；三是台湾一家网站说，从阳明神农坡医学院九一级医学系可以查到这首诗的蛛丝马迹，可推定这是集体创作接龙的。至此，大家取得了共识：诗虽然不是泰戈尔写的，但写得不错，可署“佚名”在各场合演出，但这次世界著名朗诵会就不适合上台了，于是换了泰戈尔的另一首诗。为小小的一首诗竟折腾了那么些人，最后还没有朗诵成，但是大家都那么认真，我想，这才是做事情应该有的样子吧。

2014年初秋，我去北京拜访刘厚生同志，他是我的老领导，94岁高龄，瘦多了，腰更弯了，可他说，脑子好，耳不聋，胃口健，还能慢慢地写点短文。正在写纪念程砚秋的文章，他说，程砚秋还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戏曲教育家，一位世界进步文化的追求者。抗战时期，他拒绝为敌伪演出，退出舞台，坚持民族气节，对于这样一位为戏曲艺术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艺术家，我们要怀念他、学习他、不可淡忘他。

厚生同志生活上一贯简单朴素，他说，老年生活简单得很，没什么多需求，他现在的愿望，一是再看点自己想看的书，写点自己想写的文章；二是脑子别糊涂，有空背诵古诗，增强记忆力。可他对帮助别人与社会公益，都慷慨大方。前年，他和老伴把多年积蓄50万元捐给中国剧协，给青年同志办个图书馆，又陆续把藏书赠送出去……他安排一切那么平和、淡定，那天，我向他告别时，他拄着拐杖送我到电梯

口，又以平和淡定的语气说：“也许这是最后一次见面……”我立即说，不可能，我会再来看望您。他笑了：“好啊，欢迎你来，北京的秋天是最好的。”不觉三年过去，去年金秋，我再次拜访厚生同志，他，97岁了，他说，上海是我老家，家里人来了我最高兴，上海文联和剧协的同志来看我，沪剧院茅善玉也来看我，我都高兴。我常常想念上海，我常看的是上海的《文汇报》《新民晚报》《上海戏剧》，我关心上海的

戏剧活动，蔡正仁76岁能演《长生殿》，京剧《曹操与杨修》有了青春版传承，我虽然不可能像前几年经常到上海去参加戏剧活动，但是我的心总是牵挂着上海，我的老家在上海，我的好多老朋友在上海。厚生同志是1921年1月出生在北京，1931年移居上海。那时候，上海话剧演出频繁，他是个话剧迷，1937年考入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，成为第三届的话剧学员。1938年参加中国

剧协，一对母女，还有两个中年男人。我们买了票，由保安带领，出了售票处。一壁之隔的鲁迅故居门前，已有一个纤细的女孩迎候在那里，她是鲁迅故居的志愿者讲解员。保安像个大管家，掏出钥匙，打开黑漆的铸铁门，将我们带进去。由于屋内没有开灯，加之房间格局紧促，虽是坐北向南的房子，一进去还是给人阴冷的感觉。讲解员介绍着一楼会客室的陈设，餐台餐椅，墙上的画等等，而我的目光聚焦在了瞿秋白寄存此处的那张著名的书桌上了。只三二分钟吧，就被保安吆喝着去二楼。二楼是鲁迅的书房兼卧室，不很宽敞，南窗和西墙摆放着书桌、藤椅、镜台、茶几、台灯等旧物。最让人触目惊心的是近门处东墙边的那张黑色铁床，上面还摆放着棉被和枕头，鲁迅先生就是在这张床上，吐出最后一口气的。而那最后一口气是真的散了，还是附着在了室内的台灯上，做夜的眼？或是附着在了南窗的窗框上，做曙光的播撒器？

保安又催促着上了三楼，海婴的客房，以及客房都在此。看着小小的客房，想着瞿秋白曾在此避难，也曾在此奋笔疾书，无比伤怀。这时参观者中最年轻的初中生模样的女孩发现了问题，她问讲解员，二楼有鲁迅的床，三楼有海婴的，许广平睡在哪里呀？讲解员一时被问住了，女孩的母亲赶紧说，许广平要和鲁迅睡一张床，要么是海婴。我加了一句，海婴有保姆的。女孩依然很不满地嘟囔道：许广平为什么没有自己的床啊！

保安已下到一楼，他在下面大声呼唤讲解员，让她赶快带游人出来，说是时间到了，其实我们进来不过一刻钟。下楼时我走到最后，又在二楼鲁迅卧室门前驻足片刻。等我下去，保安在训斥讲解员，说她不该把游人留在最后，说这是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好像我走在最后，似有不轨意图。我郁郁出了鲁迅故居。其实我很想看看灶房的陈设，萧红不是在这儿为鲁迅烙过东北特色的韭菜盒和油饼吗？我回到山阴路上，风又起来了，这条路成了风匣，回荡着风声。我去寻访不远处的那扇破门，见黑漆大门紧闭，门上贴满了菱形贴纸印痕，分明昭示着“福”字曾居其上，想来这里还住着人家吧。而这扇门，却也是瞿秋白生命中难得的一扇破门，因为在此期间他与鲁迅交往频繁，纵有有时被捕的危险，但有倾心长谈的挚友，仍是人生的黄金时光吧。

鲁迅先生与很多青年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，萧军萧红，台静农，瞿秋白等等。读鲁迅书信时，发现他最喜欢与两个人谈病情（当然他们也深切关心着他的身体），一个是母亲，一个是小他二十几岁的台静农。谈病如同谈隐私，多半是对亲人才讲的话题。而同样比鲁迅年轻许多的瞿秋白，更是深得他欣赏，有鲁迅赠与瞿秋白的手书“人生得一知己足矣，斯世当以同怀视之”为证。瞿秋白就义后，鲁迅抱病为他编校《海上述林》。我读瞿秋白的《多余的话》时，感觉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流露的还是对做一个文人的万般不舍。

在瞿秋白故居吃了闭门羹，我赶紧折回，因为午后《收获》杂志有作品朗诵会，我怕迟到，所以赶紧打车，想回到酒店稍事休整。可是往来的出租车，基本都载客，显示空载的车辆，停下的一瞬，总问我是约车的人吗？我这才明白，因为我不用手机上网，不能随时网上预订出租车，空驶的出租车与我这个不与俱进的人来说，多半无关了。也就是说，我在漂泊的河流上，看见灯塔闪亮，那也不是引我上岸的。这倒让我淡定起来，轻松起来，想着万一迟到，那是为着鲁迅先生而迟到，不无美好。我迎着风，在山阴路上徘徊。相比鲁迅的杂文，我更偏爱他的小说，尤其喜欢《故事新编》，尽管他在致捷克汉学家普实克的信中，说这本小说神话和传说做材料的书，并不是好作品

诗，署名泰戈尔，称摘自同年第5期《女子文学》，但该杂志一位编辑透露，是从网上弄来的，不可靠；二是香港女作家张小娴1997年完成的小说《荷包里的单人床》的封面上借书主人公苏盈之口说了这段话，在该书2000版的序中张小娴声明不是抄泰戈尔的；三是台湾一家网站说，从阳明神农坡医学院九一级医学系可以查到这首诗的蛛丝马迹，可推定这是集体创作接龙的。至此，大家取得了共识：诗虽然不是泰戈尔写的，但写得不错，可署“佚名”在各场合演出，但这次世界著名朗诵会就不适合上台了，于是换了泰戈尔的另一首诗。为小小的一首诗竟折腾了那么些人，最后还没有朗诵成，但是大家都那么认真，我想，这才是做事情应该有的样子吧。

2014年初秋，我去北京拜访刘厚生同志，他是我的老领导，94岁高龄，瘦多了，腰更弯了，可他说，脑子好，耳不聋，胃口健，还能慢慢地写点短文。正在写纪念程砚秋的文章，他说，程砚秋还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戏曲教育家，一位世界进步文化的追求者。抗战时期，他拒绝为敌伪演出，退出舞台，坚持民族气节，对于这样一位为戏曲艺术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艺术家，我们要怀念他、学习他、不可淡忘他。厚生同志生活上一贯简单朴素，他说，老年生活简单得很，没什么多需求，他现在的愿望，一是再看点自己想看的书，写点自己想写的文章；二是脑子别糊涂，有空背诵古诗，增强记忆力。可他对帮助别人与社会公益，都慷慨大方。前年，他和老伴把多年积蓄50万元捐给中国剧协，给青年同志办个图书馆，又陆续把藏书赠送出去……他安排一切那么平和、淡定，那天，我向他告别时，他拄着拐杖送我到电梯

口，又以平和淡定的语气说：“也许这是最后一次见面……”我立即说，不可能，我会再来看望您。他笑了：“好啊，欢迎你来，北京的秋天是最好的。”不觉三年过去，去年金秋，我再次拜访厚生同志，他，97岁了，他说，上海是我老家，家里人来了我最高兴，上海文联和剧协的同志来看我，沪剧院茅善玉也来看我，我都高兴。我常常想念上海，我常看的是上海的《文汇报》《新民晚报》《上海戏剧》，我关心上海的

戏剧活动，蔡正仁76岁能演《长生殿》，京剧《曹操与杨修》有了青春版传承，我虽然不可能像前几年经常到上海去参加戏剧活动，但是我的心总是牵挂着上海，我的老家在上海，我的好多老朋友在上海。厚生同志是1921年1月出生在北京，1931年移居上海。那时候，上海话剧演出频繁，他是个话剧迷，1937年考入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，成为第三届的话剧学员。1938年参加中国

（我以为那是自谦的说法）。其中的《铸剑》，惊心动魄，我是把这个短篇当史书来看的。鲁迅是个高超的人物雕塑家，他小说的人物，像是青铜锻造的，叩击时会有深沉的回声。而且这些人物身上洋溢着一种动人的光芒——悲凉的诗意之光，像《孔乙己》《阿Q正传》《祝福》《风波》《药》《伤逝》《在酒楼上》《明天》等堪称经典的篇章，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，是一个人以笔蘸着自己的生命之血，化解心中块垒时，播撒于春日晓雾中的纯美幽灵。因为他们充满了有筋骨的象征性和寓言性，成了精了，因而太阳出来也不会被照散。我想鲁迅公园中世界文豪广场的雕塑，如果换成阿Q，祥林嫂，孔乙己，单四嫂子，九斤老太，闰土，眉间尺，吕纬甫，也是极相宜的——这些人哪个不是负重的极手呢。

我还喜欢鲁迅与许广平在厦门广州间的一封信通，鲁迅说那里的点心很好，但不敢多买，因为有小而红的蚂蚁，无处不在，啃噬点心，害得他常把附着蚂蚁的点心丢掉；许广平给他回信，让他在点心周围，用石灰粉画一个圈，就可以防蚁，他的点心就不会被蚂蚁糟蹋了。记得当时我读这段时，会心一笑，因为我想起了幼时，祖父怕小孩子去偷他菜园里的瓜果，常给熟了的瓜果拦腰拴上线绳做记号。我去偷摘他的柿子吃时，得先把那“护身符”小心解开。对待如我这般偷吃的孩子和蚂蚁来说，许先生所言的石灰粉，祖父的那圈“绳索”，多半是不顶用的，但从中可以看出他们感情的美好。

走在山阴路上，我浮想联翩，鲁迅在厦门所钟爱的点心，还在年复一年的出炉吧？那样的红蚂蚁也还在妖娆地匍匐吧？可当年为蚂蚁所烦恼的人，是另一个世界的星辰了，有多少人真心地怀念，视他为奇迹和烟火？

从鲁迅谢世之所到他长眠之地，并不遥远。但这条路在我眼里却很长很长，它仿佛记录着一个人半个多世纪的跋涉。走在异乡的街头，只觉得这里的冬天与我故乡相比，更像春天，因为因风烁的花朵，像黑夜的笑声，从苍绿中挣扎而出。这样的花朵也就格外明亮和湿润，就像感动的泪。我想起了看过的一个报道，对东方音乐很感兴趣的俄裔音乐家齐尔甫，曾托贺绿汀带信给鲁迅，想请他写歌剧《红楼梦》的剧本，而鲁迅也答应了，可他不久就告别了世界。

鲁迅曾在文章中几次提到《红楼梦》，他对最终“披大红猩猩毡斗篷和尚”的宝玉，有个评价，说是和尚多矣，但披这样阔斗篷的能有几个；他在《言论自由的界限》中，说贾宝玉言论不自由的地方，而仗着酒醉骂主子的焦大——“实在是贾府的屈原”。我想鲁迅若写歌剧的《红楼梦》，最华丽的乐章，会出现焦大、刘姥姥这类人物身上吧？因为那是鲁迅熟谙的人物，也是映照繁华终归是虚妄一梦的最透彻的镜子。

神化鲁迅，将他符号化；矮化鲁迅，将他妖魔化；强化鲁迅作品无人能及的思想性，视他作品的艺术创造性而不见，都是客观评价。作为一个读者和文学后来人，一个是母亲，一个是小他二十几岁的台静农。谈病如同谈隐私，多半是对亲人才讲的话题。而同样比鲁迅年轻许多的瞿秋白，更是深得他欣赏，有鲁迅赠与瞿秋白的手书“人生得一知己足矣，斯世当以同怀视之”为证。瞿秋白就义后，鲁迅抱病为他编校《海上述林》。我读瞿秋白的《多余的话》时，感觉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流露的还是对做一个文人的万般不舍。

在瞿秋白故居吃了闭门羹，我赶紧折回，因为午后《收获》杂志有作品朗诵会，我怕迟到，所以赶紧打车，想回到酒店稍事休整。可是往来的出租车，基本都载客，显示空载的车辆，停下的一瞬，总问我是约车的人吗？我这才明白，因为我不用手机上网，不能随时网上预订出租车，空驶的出租车与我这个不与俱进的人来说，多半无关了。也就是说，我在漂泊的河流上，看见灯塔闪亮，那也不是引我上岸的。这倒让我淡定起来，轻松起来，想着万一迟到，那是为着鲁迅先生而迟到，不无美好。我迎着风，在山阴路上徘徊。相比鲁迅的杂文，我更偏爱他的小说，尤其喜欢《故事新编》，尽管他在致捷克汉学家普实克的信中，说这本小说神话和传说做材料的书，并不是好作品

诗，署名泰戈尔，称摘自同年第5期《女子文学》，但该杂志一位编辑透露，是从网上弄来的，不可靠；二是香港女作家张小娴1997年完成的小说《荷包里的单人床》的封面上借书主人公苏盈之口说了这段话，在该书2000版的序中张小娴声明不是抄泰戈尔的；三是台湾一家网站说，从阳明神农坡医学院九一级医学系可以查到这首诗的蛛丝马迹，可推定这是集体创作接龙的。至此，大家取得了共识：诗虽然不是泰戈尔写的，但写得不错，可署“佚名”在各场合演出，但这次世界著名朗诵会就不适合上台了，于是换了泰戈尔的另一首诗。为小小的一首诗竟折腾了那么些人，最后还没有朗诵成，但是大家都那么认真，我想，这才是做事情应该有的样子吧。

2014年初秋，我去北京拜访刘厚生同志，他是我的老领导，94岁高龄，瘦多了，腰更弯了，可他说，脑子好，耳不聋，胃口健，还能慢慢地写点短文。正在写纪念程砚秋的文章，他说，程砚秋还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戏曲教育家，一位世界进步文化的追求者。抗战时期，他拒绝为敌伪演出，退出舞台，坚持民族气节，对于这样一位为戏曲艺术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艺术家，我们要怀念他、学习他、不可淡忘他。厚生同志生活上一贯简单朴素，他说，老年生活简单得很，没什么多需求，他现在的愿望，一是再看点自己想看的书，写点自己想写的文章；二是脑子别糊涂，有空背诵古诗，增强记忆力。可他对帮助别人与社会公益，都慷慨大方。前年，他和老伴把多年积蓄50万元捐给中国剧协，给青年同志办个图书馆，又陆续把藏书赠送出去……他安排一切那么平和、淡定，那天，我向他告别时，他拄着拐杖送我到电梯

口，又以平和淡定的语气说：“也许这是最后一次见面……”我立即说，不可能，我会再来看望您。他笑了：“好啊，欢迎你来，北京的秋天是最好的。”不觉三年过去，去年金秋，我再次拜访厚生同志，他，97岁了，他说，上海是我老家，家里人来了我最高兴，上海文联和剧协的同志来看我，沪剧院茅善玉也来看我，我都高兴。我常常想念上海，我常看的是上海的《文汇报》《新民晚报》《上海戏剧》，我关心上海的

戏剧活动，蔡正仁76岁能演《长生殿》，京剧《曹操与杨修》有了青春版传承，我虽然不可能像前几年经常到上海去参加戏剧活动，但是我的心总是牵挂着上海，我的老家在上海，我的好多老朋友在上海。厚生同志是1921年1月出生在北京，1931年移居上海。那时候，上海话剧演出频繁，他是个话剧迷，1937年考入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，成为第三届的话剧学员。1938年参加中国

## 回音壁

# 从姐弟俩的手抄书谈起

过传忠

去年12月21日《笔会》上发了曹景行写的《从手抄书谈起》，看得我很喜欢。此刻我也来写篇文章，标题只是在景行原稿中加上“姐弟俩的”一个定语于“手抄书”之前，所谈的内容也就不言而喻了吧！

景行是著名话剧演员曹雷的弟弟，他们姐弟是前辈学者曹聚仁先生的哲嗣。我和曹雷读中学时就是朋友，与小弟直接交往虽不算多，但早就知道他是位嗜读如命的神童，他家对面少儿图书馆的书都给他看遍了。如今，又从文章中了解到他曾把《光荣与梦想》这样的书“一边抄一边看一边思考”，而且成了他经常做的事，在佩服之余，更感受到了他事业之所以成功的秘诀。

无独有偶。景行的手抄书我没见过，其姐曹雷的手抄书我倒是饶有兴趣地阅读过。那是在“文革”后期，曹雷可能会改行当导演。她说设法找来些外国经典影片的剧本，因为一来是犯禁的，二来必须限期归还，她就抓紧抄下来，以备学习参考。我从她那里读到《魂断蓝桥》的剧本，而且是导演本，抄在一本蓝封皮的小簿子上。这些艺术营养，对她的电影配音事业，包括对她体现在方方面面的艺术修养都绝对是颇有裨益的。

手抄书之外，我还读过她写的角色小传。在读上戏快毕业的时候，她们班排《桃花扇》，她演李香君。戏份很重，人物也很有光彩。她一开始在案头工作时就很认真，除了完成一般

的人物分析外，在一些重要的节点，一些重大的戏剧动作前后，她都角色写下了相关的内心独白。在被打得头破血流之后，她把香君对自己的遭遇，对不同的人物的内心活动，写得丝丝入扣，动情感人。在他们姐弟俩数十年的从业经历中，这些虽然都只是一些细节，但从中所体现的事业心、责任感以至于性格中的决心和毅力，却是令人感动的。这当中有一种庄重感，不管做什么事，有了这份庄重，把追求视为一份神圣，没有什么事干不好的。

现在有些青年演员，不太重视文学修养，甚至有意无意地忽视案头工作。一位导演朋友告诉我，他导演时，要一位演员作人物分析，谈了三言两语之后，演员竟有些不耐烦地说：“反正他是双子座，不就那回事！”照他看来，靠角色的星座属相就能把问题都解决了，难怪一切都习惯“台上见”吧。这不是把艺术事业看得太轻松了吗？庄重不起了啊。

不过，这不是多数人，看重自己所做的事的，应该还是不在少数。去年底，协作与上图要举行一场世界名著朗诵会。我在策划时想起了著名演员陈少泽和赵静曾朗诵过的一首诗《世界上最远的距离》，作者署名泰戈尔，效果挺不错。这是现成的，何不安排进节目？可与上图具体落实此事的工作人员沙莎联系后，不久她就告诉我抄遍了泰戈尔的集子，都找不到这首诗，她又问了别人，答案众